

“多元”如何“一体”

——华夏多民族国家构成的大传统奥秘

叶舒宪

一、文明发生：人类的最大作品之由来

关于人类文明的由来问题，19 世纪的标准答案是环境说，如泰纳的“种族、地理和环境”。20 世纪以来，魏特夫“水利造就文明”说流行一时。基于考古学的新知识范式，以柴尔德《人类创造了自身》为标志，是简明扼要地阐述人类文明起源奥秘的理论典范之作。从学科分类上看，其理论创新被概括为一个标志新兴交叉学科的关键词“认知考古学”。将考古学所发现的各个地方文化之演进，用人类认知的统合视角给予整体的、动力学的诠释，从而说明人类为什么会先后脱离狩猎采集、原始农耕和畜牧，终究迈进文明国家的门槛。

英国考古学家伦弗瑞在《史前：文明记忆拼图》(原文: *Prehistory: Making of the Human Mind*, 2007.) 一书中指出，认知考古学的特色在于从考古学所关注的遗址与文物，转向遗址和文物所代表的史前人类心智及其进化过程，亦即文明化的过程。对于文明的判断，除了过去特有的一些物质指标，如城市、文字和青铜器等，伦弗瑞又添加了精神方面的指标：思想模式和由此带来的特定文化的价值观。他认为在物质与精神之间，起到关键性的动力要素是精神，而不是物质。“我们现在才刚开始了解人类思想模式的改变，这可能是人类环境中一些重大进展或转变的基础。”社会变迁的基础方面是思想观念，这在 19 世纪被看成是属于“上层建筑”，其下的基础则称为“经济基础”。究竟是以物质生产力为基础还是以人的观念为基础，当代认知考古学主张的是后者。

文明不同于史前的最大特点是，史前人类似乎走的是统一性的道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到文明时代。从狩猎采集到农耕或畜牧生产。总之，是世界各地大体一致的同样进程。文明则完全不同，笼统而言的人类文明，其实是由若干地域性的文明国家构成的“拼图”。就其发生的时间顺序而言，有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阿卡德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克里特文明、米诺文明、华夏文明、希腊文明等。这些文明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与其他文明判然有别，所以史前史研究也就必然要解释文明发生现象，不仅需要说明人类走出史前史而进入文明史的一般原因，而且要研究特定文明国家诞生的文化基因差异，说明是什么因素导致古埃及文明建造出金字塔一类的标志物，而古希腊文明则孕育出奥林匹克运动和悲剧诗人，华夏文明则以玉礼器和青铜器为社会权力和等级的标志物，并从巫史传统中催生出历朝历代延续不断的官修史书编撰模式。

对不同文明的文化基因考察，将揭示特定文明国家及其人群的特殊奥秘。就中国文明而言，需要从思想模式和价值观方面说明中国为什么是中国，中国人为什么是中国人，这理所当然地成为一部“中国文明发生史”的题中之意。

《史前：文明记忆拼图》一书第九章题为“古人的宇宙观”，伦弗瑞在此明确提出：

在人类社会，有形物质如何能够呈现意义而产生新的制度事实；人类创造了物质符号，于是形成可感知的现实。

新的物质性使得新的社会互动成为可能。

物质和财货是如何呈现价值与意义，之所以如此，是透过人类这种赋予无生命物质意义的特殊习性，因而使这些事物成为象征符号，但是它们不只是象征符号，实际上还能将财富具体化，而且能授予人类权力。

伴随特定的地域文明发生而产生的特定神话信仰观念，占据着异乎寻常的地位，对该文明的所有成员——从社会最高统治者到最下层平民，都发挥着潜在的行为支配作用。

伦弗瑞对神话思维及其行为支配作用有清醒的意识，他引用唐诺（Donald,R., 1991, *Origin of the Modern Mind : Three Stages in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的文化三阶段理论，称为“人类发展之神话阶段”：随着语言和叙事的发展，有关过去的经验的解释和传说必定会被用来解释现状。

我们无法直接接触到史前时期所构思出的神话故事。然而，我们确实能获得早期社会活动的痕迹，借由这些活动，人类试图透过他们在世上的行动与这些现实产生关联，他们的行动曾留下某种物质痕迹。

对于古埃及文明来说，古埃及人留下最显著的物质痕迹就是金字塔，其时间距今约 5000 年。对于英格兰平原史前居民来说，所留下的最显著的物质痕迹是巨石阵，其时间距今也是 5000 年。对于华夏河套地区的史前居民来说，最显著的物质遗迹是两种：巨大的石头城池与点缀其间的玉礼器。二者一大一小。大者为石头，小者为万千种类的石头中特殊筛选出来的一种——玉石，用来加工成负载神话信仰意义的玉礼器。借用伦弗瑞的说法：“在我们尚未详细确认事项中，其中一项是人造器物在社会关系方面的具体意义。”因为人造器物也可以被赋予神性的特质，所以，“更精确地说，许多社会关系是靠财货与人工器物来维系。在欧洲新石器时代，打磨光亮的石斧（偶尔会以玉石制作）明显具有比较高的价值。当人类后来懂得识别与使用黄铜和黄金后，新的价值系统就出现了。欧洲青铜器时代即奠基于这样的价值系统，并伴随强大的武器工具，如由新材料制成的刀、剑等”。

石斧与玉斧在华夏史前史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后来的青铜和黄金出现之后，玉斧的至高价值并没有被金属器物完全取代，而是形成微妙的新老圣物组合价值，所谓玉振金声或金玉良缘的说法，即是这种新老结合的明证。精致打磨的史前



图 1，何谓玉教大传统：安徽含山凌家滩 07M 墓出土玉礼器群——墓主人身下全是玉钺，其玉料为就地取材的杂色玉，没有白玉，距今 5300 年

石斧玉斧，在世界不同地域的社会中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意义，但是唯独在华夏文明中演变成象征王权的玉钺和铜钺，这种情况和华夏史前期长久的玉石神话信仰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距今 5300 年的安徽凌家滩文化中，在距今 5000 至 4000 年的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中，玉钺如何升格为首屈一指的王权象征物（图 1），可以在合肥的安徽省博物馆以及杭州余杭区的良渚博物院展厅中得到直观的关照和体会。对照有关 3000 多年前商周易代之际的历史叙事，周武王手执黄钺斩下殷纣王的头颅，再用玄钺斩下殷纣王妻妾的头颅之细节，也就有了基于文化大传统的深度理解之新知识条件。换言之，5000 年前玉钺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的至高神物、圣物，3000 年的改朝换代大革命为何要让最高统治者用斧钺来完成最后一击，就容易理解了。这是从前文字时代的符号叙事大传统理解文字叙事小传统的生动案例。

我们参照韦伯论证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模式，提出“玉教伦理与华夏文明精神”的命题，希望揭示出使得华夏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文化基因密码”——物质与精神的互动关联及其所铸就的核心价值观。

二、玉教传播：中国玉文化发生期的多元与一体

地域多元和多色彩是东亚史前玉器用料的普遍情况。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学院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织的《安徽凌家滩出土古玉器玉材来源考察结果》认为：5300 年前的凌家滩玉器基本上是就地取材的多种玉石材料：

（1）5300 多年前的交通是很不发达的，只有人力、牲口和漂流，一般来说，古人会就近取材。

（2）肥东县桥头集双山——小黄村一带晋宁期片麻状闪长岩与下元古界双山组（Ptish）镁质大理岩的接触带中具有形成蛇纹石玉和透闪石玉的地质条件。本次考察就找到了蛇纹石玉、含方解石蛇纹石玉、方解石透闪石岩、透闪石大理岩。蛇纹石玉与蛇纹石玉质的古玉器的基本宝玉石学特征可以对比。

（3）火山岩、泥岩、粉砂岩、大理岩、滑石等石料采自周围的火山岩盆地和太湖山一带的沉积岩层中。这些石料并不稀少，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去采。

（4）古人的用玉观与现在有一致的，即将自然界分布稀少、细腻、温润、美丽的石头作为珍品，琢制成精美的礼玉、饰玉等；也有与现在不同的，如喜欢五颜六色的花斑状的石头，这些石头分布较多、块体也较大，故用来制作石钺、石斧等工具和仪

仗器。

从史前文化的局部看，每一地方性玉礼器生产的就地取材，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玉矿种类的多元性。再从全局视角看，各地的多元性玉石资源汇合成玉料取材的更大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到距今约 4000 年至 3000 年的夏商周国家阶段，由于西玉东输的曙光初现，这种多元性局面逐渐发生转变，即向一元性局面的演变。从使用地方性的各种玉石向集中使用西域输送而来的昆仑山和田玉（古书称为“昆山之玉”）的转变。除了玉礼器种类（如琮璧圭璋等）的中原王朝一元性整合趋势外，玉料的选择方面也出现向优质透闪石玉材集中的趋势，而且愈演愈烈，到东周和秦汉时代，玉器加工技术出现突飞猛进的大发展，玉材的使用也形成和田玉独尊的一统天下局面。只有在充分认识到“昆山之玉”的优越性和唯一性的认识转变基础上，才会产生出儒家以“温润”为第一物理特征的顶级玉材标准价值。用今日的玉器收藏界经验标准，温润与否是和和田玉中的上等籽料所特有的物理特点。君子温润如玉的人格理想，使得以温润为最大特色的和田玉的文化品格得到普遍的认同和推崇，由此奠定此后两千多年玉文化发展的主流。

物质方面的玉石资源之变化，必然导致精神价值方面的观念变化。玉石资源从多元到一元的转变，非常突出地体现在东周以来的历史叙事中，诸如卞和向楚国最高统治者三献玉璞的典故，完璧归赵的和氏璧典故，秦始皇用和氏璧改制传国玉玺的典故，都明确凸显天下宝玉的唯一性，史书叙事中的宝玉被描绘得神奇无比，至高无上，舍我其谁。这些叙事不是文学却胜似文学。对此，我们找到的迄今最恰当的概括词语是“神话历史”。尤其是秦始皇销天下之金，唯独选中宝玉制成大一统帝国象征之玉玺的史实，让玉在宇宙万物中独尊的至高地位，一直延续到清代的末代皇帝玉玺，甚至延续到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设计。

大传统的地方性多元玉矿资源，为什么在文明小传统中变化为一元性的至尊宝玉崇拜呢？玉教即玉石神话信仰的数千年演进过程中发生着怎样一种九九归一的大变革呢？

先看商代的最高统治者——末代帝王殷纣临终的玉文化表演。《逸周书·世俘》云：

商王纣于商郊。时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缝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于千人求之，四千庶（玉）则销，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销。

对于接替殷商王权而受天命统治中原的周朝王者来说，前朝统治者遗留下来的所有宝玉，皆可作为天命转移和权力转移的有效物证，所以有必要照单全收，藏之王室，

而不必像处置异族的神像、图腾、牌位那样加以取缔或销毁。《逸周书·世俘》篇讲完商王自焚一事，接着叙述的就是周王继承殷商宝玉一事：“凡天智玉，武王则宝与同。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这里上亿件的玉器数量让后人百思不得其解，有各种不同的解释。黄怀信依照各类书的引文校注说：这一句话在“俘商旧”后面脱落了“宝玉万四千佩”六字。“百万”当作“八万”。翻译成现代汉语应是：凡属天智玉，武王就与宝玉同等看待。武王一共缴获商朝的旧宝玉一万四千枚、佩玉十八万枚。

不论认为这是历史还是神话，《逸周书》的叙述至少可以表明殷周革命之际有一笔巨大数量的宝玉更易主人。即使不采用有夸张之嫌的上亿之说，也还有近二十万枚玉器被纳入周王室宝藏。在其财富和奢侈品的后起意义之前，宝玉在文明初始期的更高价值是代表神圣和天命。值得我们从跨文明比较的视角思考的是：为什么史籍上要特别强调商周革命时惊人数量的宝玉继承情况，却对金银器、青铜器等其他贵重物品不置一词呢？对于记述三代史实的著作者而言，是怎样一种独特的、来源于大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发挥作用，在暗中支配着史官叙事的取舍和关注焦点呢？

商纣王自焚之际烧掉了除天智玉之外的宝玉。这一细节清楚表明商代统治者珍视的玉石是多元性的，这一点从考古发掘的商代墓葬用玉情况已经得到充分证明。

再看西周初年的最高统治者珍藏的王室秘宝情况：《尚书·顾命》讲到周成王病危，周康王将继位之际，西周朝廷中的珍藏国宝都被摆出来陈列：

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

在西周王室珍藏的国宝中，排列在前面的十种物质，从名称上看几乎全部是玉石类的物质。而“越玉”和“夷玉”之类的名称中还清楚地透露出多地区和多民族之物产信息。就此而言，3000年前的中原国家统治，从其首要战略资源依赖性看，就是中原国家以外辐射性的广大区域内出产的玉矿玉料。那时新疆和田玉已经进入中原，但是还没有像东周时期那样获得至高无上的价值。在儒家的温润人格理想取法于和田玉的价值标准成立之前，是玉石的多元性为主。只要看看周武王伐纣的联合大军中，有多少非中原族群的成分，就知道周人的民族团结功力如何了。周王室为什么有那么多来自各个民族地区的宝玉石问题，可不言自明。

在温润人格标准确立之后，玉石的多元性必然让位于一元性。为了保证数千公里以外的和田玉资源不断供应，需要从黄河中游到上游，再到河西走廊和北方草原，整

个西域的多民族地区间贸易与交往关系。由此拉动的华夏最高价值必然是照顾到国家资源依赖局面和西玉东输远距离贸易需求，即以多地域、多民族之间的彼此互利互惠关系为现实基础，用儒家的表述称为“化干戈为玉帛”。

“化干戈”是中国先民处理多元文化关系的和平主义理念，其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玉帛”。离开对玉帛的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深入理解，华夏文明能够认同和凝聚多民族文化为一体的具体经验遗产就难以揭示。因此，下文侧重从物质方面说明玉这种物质在东亚史前大传统的信仰建构和神话编码情况。

东亚玉器时代的前身是石器时代。玉器时代最终因融入青铜时代而告终结。需要辨识的一点是，玉器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玉器生产的结束，只是玉器生产独领风骚的局面不复存在，而且是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金属器与玉器并重的时代。就此而言，玉器时代的末段与金属时代的早段有所重合。金玉并重的价值观从夏商周到明清，贯穿着中华文明史的全程。这样的情形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好像金和玉一开始就是并驾齐驱的宝物、圣物。其实二者进入华夏的时间早晚相差很大，需要重建玉器独尊的年代谱系，方能有效透视玉器大传统与金属小传统的发生学关系。

三、“多元”如何“一体”：玉教的“新教革命”

史前期的玉文化发生发展呈现出多元向一体的进化过程。把 8000 年前肇始于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玉器视为东亚玉文化的开端，把随后的玉文化发展看成一个玉教信仰从小到大，从点到面的传教和扩散过程，大约在 4000 年前完成其对史前中国的较全面覆盖。进入文明以后，在距今 3000 多年的商周之际发生了东亚玉文化史上类似于“新教革命”的大变革：西周最高统治者的注意力，从四面八方得来的地方性杂色玉料或玉器（如夷玉、越玉、赤刀等），逐渐转向从西域输送来的新疆昆仑山和田玉，尤其是和田玉中的白玉，其神圣价值后来居上，凌驾在以往所有的多元玉料之上，形成和田白玉独尊的新神话（围绕昆仑山和西王母）和新教义，其直接结果是东周时期形成的“白璧无瑕”中国式完美理想，以及儒家“君子温润如玉”的人格理想，可见这种玉教的新教革命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影响巨大而深远，甚至直接决定当代玉器生产的资源供给模式和羊脂白玉位于价格金字塔顶端的特有文化现象。

周朝的天子用来和亲与结盟各地方族群的物质纽带，首屈一指就是玉石，其次是黄金等贵金属，再次是马匹和丝绸。《穆天子传》所反映的历史真实性，如果说和

西周的情况有所出入，那么大致对应着东周的情形。周穆王到河套地区用玉璧拜祭河神，再到昆仑山晋见西王母，用的还是玉璧玉圭。这位周朝统治者一路上所持有、所奉送出的玉礼器，为什么是几千公里的范围内通用的？玉礼器的统一性，何以覆盖面如此广大？原来有一种相对统一的信念借助于信仰的传播力而支配着中原国家的意识形态，那就是昆仑玉山西王母的神话，该神话的意识形态作用突出三点：其一，神圣地点——西方昆仑山；其二，神圣物质玉的独尊性来源，即昆仑山和田玉；其三，将神圣性、不死性与美玉三要素合为一体的人格化形象——西王母女神。如果将周代的意识形态建构视为华夏核心价值观的初步定形，那么与西王母相关的神话突出表现出白玉崇拜、白玉独尊的思想观念，在其中一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奠基性作用。

从东周到秦汉魏晋，数百年时间里出现的西王母来到中原王朝献白环的各种叙事，是其很好的例证。《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条云：

九年，西王母来朝。

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玦。

清代学者徐文靖撰《竹书统笺》，对这两条记载所做的笺释，主要是大量排比相关素材，展现对西王母主动与中原王朝交往的这个献宝事件的多种叙事版本。兹列举如下：

按：《地理志》：“金城临羌县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盐池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大戴记》曰：“舜以天德嗣尧，西王母献其白管。”《世本》曰：“舜时西王母献白环及珮。”《杂书灵准听》曰：“舜受终，西王母献益地图。”欧阳询曰：“西王母得益地之图来献。”

按：《瑞应图》曰：“黄帝时西王母献白环，舜时又献之。”《晋志》曰：“舜时西王母献朝华之管，以玉为之。及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管一枚。”咸以为舜时西王母所献云，意是时王母以玉管献舜，舜或赐象，鼻亭去泠道不远，故于舜祠下得此。

以上徐氏《竹书统笺》引述的文献多种，内容大同小异，差异的是所献宝物：白环玉玦、白管、益地图、白环、朝华之管、玉管。他未能引述的数据，还可加上两条：其一是应劭《风俗通义·声音》管条下之“白玉管”。其二是《汉书·律历志》注云“西王母献舜白玉，以玉为管也”。

把所有这些文献集中起来，计有《竹书纪年》《大戴记》《世本》《杂书灵准听》《瑞应图》《晋书·礼乐志》《风俗通义》《汉书·律历志》注，总共有八种不同的西

王母献宝记述，其中指玉者七条，指地图者一条；指玉的七条中，讲到白玉或白玉器者六条，占比百分之九十三。其中最早著录的《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成书，较晚的书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此可知西王母献白玉（器）是古代流传最广的说法，数百年来早已深入人心。《后汉书·马融传》云：“纳焦饶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环。”西王母与白玉环，几乎成为远古圣王年代的珍贵瑞兆之文化记忆。杜甫在《洗兵马》诗中歌颂道：“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评文》亦云：“函封远致，不知何国之白环；琢刻孔章，咸曰宁王之大宝。”如果了解到西玉东输的持续数千年运动中，有大量新疆特产优质白玉成为华夏王权和社会等级建构的顶级物质资源，就不会再怀疑西王母神话中潜含着的历史真实性内涵。从屈原《楚辞·九歌·湘夫人》所唱到的“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到曹雪芹描绘贾府之富贵，用“白玉为堂金作马”，白玉崇拜主题已经借助于文学想象和修辞，弥漫到本土文化传统的方方面面。带着白玉崇拜的主题，反思对《红楼梦》影响巨大的古书《山海经》，不难看出，叙事者介绍的140座产玉之山，特别要提示每一座山出产的玉是否白玉，这样的提示在《山海经》里出现17次之多，难道会是偶然的吗？

《山海经》的各地物产叙事，首先要记述有没有玉，其次要说明有没有白玉。这究竟出于什么原因呢？也就是说，玉和白玉、是分开来作为不同类别的圣物来陈述的。同样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也有提示玉之颜色的案例：如卷二叙说穆天子在昆仑山观黄帝之宫，并用隆重的牺牲祭祀昆仑山后，继续北行，留宿在一个出产珍珠的地方“珠泽”，在水流边垂钓，说出：“珠泽之藪方三十里”一句话。紧接着发生的事件是：

乃献白玉，□只；

文本中的这一叙事似有脱落，缺乏主语，只有谓语句和宾语，不明确是谁献给谁白玉，其数量单位是只，表示数量的字却遗失了。今刊的郭璞注与清人洪颐煊校本加注云“《事物纪原》三引作‘珠泽之人，献白玉石’”。补足了叙事的主语，可知是昆仑一带的珠泽当地人向穆天子献上白玉石原料。这和上文提及的情况基本相符：昆仑山及周边地区是上等白玉的主要出产地。稍有不同的是，《山海经》认为黄帝所在地为崆峒山，距离昆仑丘有一千多里；《穆天子传》则认为黄帝之宫就在昆仑山上。把世界上最珍贵的白玉资源和黄帝、西王母等神话人物联系起来，表明白玉崇拜的玉教新教革命已经完成，西周以来统治阶层使用和田玉的情况有增无减，这就给白玉信仰的形成和普及找到现实的物质原型。

关于西周玉器生产所用玉料的材质问题，目前虽然还在探索之中，但是已经有初步的定论，足资研究者参考。如新近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的判断：

从出土情况看，各地出土玉器的种类、质量的好坏与有关遗迹的规格有密切关系。在张家坡西周墓地，较大的墓葬所出的玉器不仅数量较多，而且玉质较好，制作较精。如 M157、M170 两座井叔墓出土的随葬玉器，真玉分别占 88% 和 89%，这种情形也许是他们身份、地位的一种表示。

关于西周玉器的产地，现在还无法作全面说明，据对张家坡墓地出土玉器检测，这里的玉器多为透闪石软玉，其来源不限于一地，可能来自多个产地。上村岭 M2009 出土的 724 件（组）虽可分为白玉、青玉、青白玉、黄玉、碧玉等类，但鉴定发现，大部分为新疆和田玉。

西周玉器多用新疆和田玉的鉴定发现，是极为重要的新材料，其中的白玉和青白玉是标志玉教革命的特殊物质，在史前期漫长的玉文化发展中较为罕见（图 2）。从新疆于阗（今和田）到中原地区的里程约三四千公里，用《管子》的话说是“七千八百里”，其距离之遥古今大致相当。这条道路正是 1877 年被德国人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的文化通道。西玉东输的当代再发现，将所给过去无法想象的历史难题找出解答的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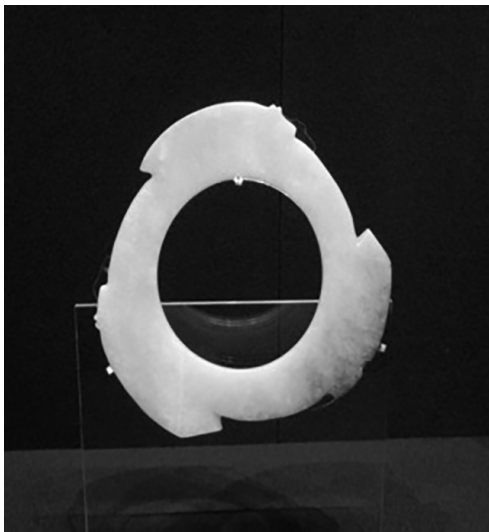


图 2，龙山文化玉器中的白玉质玉玨，摄于上海博物馆



图 3，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团在瓜州大头山采集的白玉标本

也对“丝绸之路”的西方式命名提出质疑或补充。为此，笔者和《丝绸之路》杂志策划了2014年夏甘肃省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团，驱车行走河西地区，历时15天，总行程4300公里。考察团在临近新疆的甘肃瓜州北部大头山，探查到一座长达25公里的山，盛产乳白色的透闪石玉（图3）。从玉石采样分析报告看，摩氏硬度为6，其他主要指标都接近新疆和田玉。唯有玉料的白颜色上有明显差异，和田白玉一般呈色发青，瓜州大头山的白玉呈色发褐黄。这就说明我国西部高原出产白玉的地点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古今有多少未知的玉矿储藏，至今还是谜。《山海经》记述的16座产白玉之山或水，不可能是书生在书斋里凭空想象出来的，应有其实际考察或采样的依据。

商周两代的统治者是怎样获得西域的优质玉石资源的？目前的推测是，商代统治者通过西部的羌人和北方的鬼方之人等的中介贸易作用，间接得到昆山之玉。而周穆王西征见西王母的神话叙事，表明周人在借助于西域少数民族的贸易作用之外，还有类似张骞的“凿空”西域边疆行为。这是“化干戈为玉帛”这一华夏核心价值理念得以在东周时期流行的关键。

关于上古中原核心区域与周边族群的拱卫格局，以及周人的对外关系，许倬云先生有如下陈述：“归纳这一大群以音译为名字的族群，则又可归为祝融集团包括己、董、彭、秃、妘、曹、斟、牟八姓，徐偃集团的赢、偃、盈诸姓，夏代后代的姁、己、弋诸姓，及南方的吴越，北方的戎狄。凡此都在古代中国核心地区之外围。核心地区的族群，可称为中原族群；外围的族群则可称为边缘族群。中原族群的文化系统相当第一章的仰韶——龙山系，边缘族群文化系统则祝融集团地区约略相当于屈家岭文化群，徐偃集团地区约略相当大汶口文化以下的东方沿海文化圈。夏人后代的姁、己诸姓所在，约略相当于第二章的光社文化一系列，在中原龙山文化圈以北的文化。戎狄所在，属草原文化；吴越文化所在则为长江下游河姆渡以至良渚的文化系列。周人对边缘族群的地区，可能因为文化距离较大，不可能采取完全与其在殷商地区相同的文化融合政策。大体上，周人仍是对土著文化及土著族群以融合为主，而控制与对抗只在融合不易时始为之。”如今通过优质玉石资源的中原统治者独家占有现象，不难理解周人与西部民族的交往与融合之物质纽带。生活在周代的河西走廊一带的民族并不尊崇玉教伦理，玉石资源作为“化干戈”的筹码，有效化解着“控制与对抗”的冲突局面，使得中原王朝与西域各族形成长期的互通有无和互惠互利格局。

这是本文通过西玉东输文化现象的再发现，结合华夏文明形成期的核心物质需求与核心价值形成，揭示玉教传统的白玉崇拜之教义革命，并由此找出的华夏国家从多元到一体的一个方面原因。